

·中外文化交流·

越南传入古籍略考

何 仟 年

在中越文化交流中,不只是越南搜求中国图籍,也有一些越南人的汉文作品在中国产生或流传。《四库总目》著录越南书数种,如黎勣《安南志略》、黎澄《南翁梦录》,但原属越南书籍,后传入中国的只有一部《越史略》。本文拟对从越南传入中国的数种古籍作一点探讨,遗漏不当之处,请读者指正。文中所谓古籍的著作年代大致以清代为限。

宋时,有李天祚即李朝英宗(1138~1175年在位)的《安南表状》一卷可视作来源于越南的书籍。陈振孙在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七中说:“安南表状一卷,绍兴二十五年李天祚进贡。自靖康二年以后,至是始通也。”此书亦被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收录。绍兴二十五年,在李朝为大定十六年(1155)。《大越史记全书》(以后省称《大越史记》)卷三李仁宗天符睿武七年(钦宗靖康元年),“闰(十一)月,遣令书家严常、御库书家徐延遗驯象十及金银犀兕于宋,谢擒莫贤也”。此次进贡因金人入侵,使者最后带礼物归国,未得入朝。《越史略》言,“(李神宗)天顺元年癸卯(当为戊申,1128),使赉书于宋,讣仁宗之丧,及告以王初即位。时宋高宗避金人,已渡江都临安矣”,那么建炎以后越国仍有使节之来,并非如《解题》所说至二十五年始通使。关于绍兴二十五年的朝贡,《宋史》有简略记载。《交

趾传》曰，“二十五年，诏馆安南使者于怀远驿，以彰异数”。关于它的起始，越史阙载。《越史略》记载了另一次进贡，“（李英宗）乙亥大定十六年（绍兴二十五年），宋高宗封王为南平王。至是又遣外郎阮国以赉送礼物，宋高宗赐王衣带鞍马”，但这次不是同年到宋的那次，因为《宋史·交趾传》记绍兴二十六年，“八月，天祚遣李国（即阮国）等以金珠、沉水香、翠羽、良马、驯象来贡”，那么阮国出发于李英宗大定十六年，至宋时为绍兴二十六年，他的归国时间为英宗大定十九年（绍兴二十八年）。《越史略》与《大越史记》对此有记载，文字且相同。

明代从越南传入一种《越史略》一部二册，最早于目录中著录此书的当是杨士奇《文渊阁书目》，书目前有题记曰“正统六年（1441）六月二十六日”，《越史略》书中有“今上昌符元年丁巳”，昌符（1477—1487）为陈废帝晚年号，则该书约五十后传入中国。本书明以后目录多著录，如《皕宋楼藏书志》、《抱经楼藏书志》、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、《持静斋藏书纪要》等。

越南书志多次提及明人占领期间搜掠越国著作的情况。据《大越史记》黎太祖纪戊戌（明永乐十六年）秋七月，“明遣行人夏清、进士夏时来取我国古今事迹志书”；潘辉注《历朝宪章类志·文籍志》序言：“陈末明人之变，书籍既逸于前……”，注谓“闰胡失守，时明将张辅取古今书籍部送金陵”；《钦定越史通鉴纲目》（以后简称《越史通鉴》）正编卷十三平定王二年（当永乐十七年即公元1419年）注并有被掳书籍目录，计三十余种^①。诸说中，以《大越史记》最早，《文籍志》其次。今检《明清进士题名碑记》，夏时确有其人，当是明永乐十六年中二甲者。对于这些进士人选，《明史·成祖纪》曰：“十六年春三月甲寅，赐李骐等进士及第、出身有差”，《明太宗实录》永乐十六年言，“（三月）丙寅，擢一甲进士李骐为翰林院修撰，…张铭等五人为行人”，或许夏时即入行人之选，则《大越史记》所言为有据。

又案《文渊阁书目》题记云“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，自

永乐十九年南京收回，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，未有完整书目。”而书目收《大越史略》一部二册，从名称上看，应该是尚未经过中国人整理的原书，从时间^②、地点上看也似与越史所言明人搜刮越书至金陵之事有关，但存在两点疑问，一是《越史通鉴》所列的书在《文渊阁书目》里未见一部，而《大越史略》也不见于《越史通鉴》所列书中^③。第二，据《越峤书》所收永乐四年至五年的诏谕，有多次提及焚书，其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敕张辅等曰：“屡尝谕尔凡安南所有一切书板文字，以至俚俗童蒙所习如上大人，丘乙己之类片纸只字，及彼处自立碑刻，见者即便毁坏，勿存。今闻军中所得文字不即令军人焚毁，必检视然后焚之，且军人多不识字，若一令其如此，必致传递遗失者多。尔今宜一如前敕，号令军中，但遇彼处所有一应文字，即便焚毁，毋得存留”，那么，怎么还会有像《中兴实录》、《兵家要略》这样为明人所忌讳的典籍能留存并被运至金陵呢？如果运至金陵，明《文渊阁书目》等书目中除《越史略》外，何以未见一部越南之书呢？从史料的可信程度上看，《文渊阁书目》、《越峤书》等书的年代要比《越史通鉴》和《历朝宪章类志》早^④。

《明太宗实录》十六年六月，“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，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、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、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，仍命礼部遣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”，当时交趾已为中国郡县，既“遍诣郡县”，无疑也包括交趾。《文渊阁书目》卷四记有交趾总志及交趾地方志多种，如交趾通志、谅江府志等。我们可推论，《大越史记》所言七月夏清、夏时等人往越采书是为完成纂修地志的任务。可能后来潘辉注等人误读此言，以为是明人搜刮越地书籍，致使越国文籍毁灭，不知明人在越南执行了严厉的毁书政策。另外，《越史略》也可能不是夏清等人此次带入中国的，因为如为完成编修地志的任务，带来的书应该放在北京，而非金陵。《明一统志》天顺五年御制序言，“（太宗文皇帝）遂遣使遍采天下郡邑图籍，特命儒臣大夫修纂，必欲成书。……朕念祖宗

之志有未成者，谨当继述。乃命文学之臣重加编辑，俾繁简适宜，去取惟当。”则李贤的《明一统志》继承了永乐间的材料，可以无疑。但此书的卷九十安南部分，与《越史略》文字迥然不同，未见采用、参考的痕迹。所以，明人虽曾往越南采书，但此书可能和其他越南书一样，是通过民间渠道进入中国的。

除《越史略》以外，也可在其他书目中看到零星的越南来的书籍，如朱绪曾的《开有益斋读书志》卷六著录有《越南诗选》六卷，裴璧编，刊本。本书名称经过了改动，原名应该是《皇越诗选》。裴璧即裴辉璧(1744—1818)，号存庵，黎贵惇弟子。自序作于戊申年(1788)，另有山南镇督学院楣序于明命六年(1825)。希文堂印行。原书小引称在黎贵惇《全越诗录》基础上重编而成，所收为越南李、陈、黎三代名家诗，有一百九十三位作者，诗作五百二十六首。朱绪曾所见书下落未明，但今越南汉喃研究院存有印本十一种。

《嘉业堂藏书志》卷四著录一种《摘艳集》，六卷，黄德良编，钞本，解题为缪荃孙作。本书有黎圣宗洪德二十八(1497年)编者序。黄德良，嘉林午桥人，洪德戊戌科进士。《全越诗录》称他“酷好诗学，矩步有唐，词章清丽，情景兼到”。本书所选皆陈时与黎初诸名家绝句体诗作，原书十五卷。缪氏所见抄本有黎贵惇跋语，但今汉喃院仅存吴玉玕校抄本一种，亦只六卷，无黎氏跋语。

《贩书偶记》卷七著录《皇越地輿志》二卷，孙氏曰，不著撰人姓名，约同治壬申(十一年，1872)粤东佛山金玉楼刊。本书汉喃院所收版本颇多。据《越南汉喃遗产目录提要》^⑤，巴黎国家图书馆收有1883年(光绪九年)金玉楼印本。

据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》，该馆藏有《大越史记全书》一种，日本明治十七年(1884)山堂铅印，十册。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善本书目》著录一种《南枝集》，作者阮忠贤，为越南近代著名的反法爱国者，但此书年代较晚，书有章炳麟1913年序。

注：

①参见戴可来译，陈重金著，《越南通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2年，第145页。

②永乐五年(1407)六月，安南平，布告天下，至宣德二年(1427)王通等撤出安南。

③陈重金言“据潘辉注《历朝宪章类志·文籍志》所载，被中国带回的安南典籍，计有……”等语不确。《历朝宪章类志·文籍志》未明言此部分书为明人带走。

④《越史通鉴》始作于嗣德九年(1856)，完成于嗣德三十四年(1881)，《历朝宪章类志》作于阮朝明命二年(1821)。

⑤社会科学出版社，河内，1993年，第846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文化所

本刊 2003 年封面小识

今年《文献》封面选用了国家图书馆所藏《祖庭广记》一书的插图。《祖庭广记》系蒙古乃马真后元年(1242)孔氏刻本。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栏。书中有记曰：“大蒙古国领中书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圣旨，于南京特取袭封孔元措，令赴阙里奉祀。来时不能挈负《祖庭广记》印板，今谨增补校正，重开以广其传。”该书曾经钱大昕、瞿中溶、黄丕烈、邵渊耀题跋，有“士礼居”、“阅源真赏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等藏书印。

(容坤)